

北京图书馆藏宋版书叙录 (七)

李致忠

《大易粹言》十二卷 宋曾穉辑 宋淳熙三年(1176)舒州公使库刻本。每半叶十行,行二十字,白口,左右双边。

曾穉,字献之,温陵人。淳熙中以朝请大夫知舒州军州事,又兼管内劝农营田屯田事。其他仕履及行实无考。

《大易粹言》的分卷,不同版本呈现着不同情况。北京图书馆藏有宋刻七十卷本,为每半叶十二行,行二十二至二十四字不等,细黑口,左右双边。残存六十至六十七八卷。清朱彝尊《经义考》记载此书作七十卷,又总论五卷。《四库全书》馆臣由此推测其为每卦每传皆各为一篇,刊版不相联属,故从其分篇之数,称七十有五。今观北京图书馆所藏残宋刻七十卷本,盖即朱彝尊所考见者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所著录的《大易粹言》,为十卷本。傅增湘民国三十年(1941)在北京文禄堂亦曾见过宋刻《大易粹言》,作十卷,《总论》三卷。为每半叶十二行,行二十二字,细黑口,左右双栏。序后有牌子,镌楷书二行,文曰“建安刘叔刚宅刻梓”。前有淳熙二年(1175)曾穉序。又有伊川先生《易传序》、白云先生《易说序》。后有淳熙四年(1177)程九万跋及西秦李祐之跋。序跋皆十行十六字。此本原为松江韩应陞藏书,有咸丰九年(1859)韩应陞小字跋文数行。《四库全书》录入此书时,作十卷本。其所据底本为江苏蒋曾莹家藏本,

实则即舒州公使库刻，嘉定癸酉（六年1213）张嗣古、陈造重修本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提要称此本“佚穉自序一篇，而移嗣古之跋冠其首。今从《经义考》补录穉序，仍移其跋于卷末焉。”今检文津阁《四库全书》中的《大易粹言》，实与提要所称牴牾。第一，并未录入曾穉原序；第二并未将张嗣古修版重印此书时所撰写的跋文移至卷末，而是仍然放在卷前，且标以《大易粹言序》的题目。序称：“右《大易粹言》，前太守曾君穉命郡博士方闻一所裒辑者也。虽七家之书，不无深浅异同之论，然考其师友渊源，则皆自伊洛中来。学者得此书而萃观之，则深浅异同之际，乃吾所用力之地。苟能穷其所言，以求乎至是之归，体其所未言，以造乎自得之实，则知阴阳五行升降上下，无非天理流行之妙。而画之《易》当在吾心，而不在书矣。岂徒以广耳目闻见而已哉！岁久，板漫灭不可读，因念刊书之难，复为之修改七百三十有六板，凡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九十有四字，以与学者共之，亦以无忘曾君之美意云。嘉定癸酉五月望真宁张嗣古书。”足见四库馆臣当年编书之粗疏，竟出现提要与书之实际如此不符。四库馆臣且谓此书为“宋方闻一编。闻一，舒州人。淳熙中为郡博士。时温陵曾穉守舒州，命闻一辑为是书，旧序甚明。朱彝尊《经义考》承《宋志》之误，以为穉作，非也。”（《四库全书总目·大易粹言》提要）这种随意改变此书编者的作法也是极不严肃极不负责任的。其中所说“旧序甚明”，不过指的是上述张嗣古跋文中的“右《大易粹言》，前太守曾君穉命郡博士方闻一所裒辑者也。”之言。其实这句话是不足为凭的。此书之初刻，在淳熙三年（1176），张嗣古修补板片重印此书，时在嘉定六年（1213），中间已隔三十七年。三十七年后的一纸跋文说上那么一句，就被四库馆臣拿来作为依据，否定《宋史·艺文志》的著录及朱彝尊的考定，轻易将《大易粹言》的编辑者由曾穉改为方闻一，实在不能令人信服。对此，《天禄琳琅书目续编》已提出异议，说

“《四库全书》改标方闻一编，以程序为据。然闻一列名校勘，与作跋之程九万、李祐之一例。正不必远改《宋史·艺文志》，近驳朱彝尊《经义考》，而亦未尝没闻一之名也。”且考曾程旧序，并未说命方闻一哀辑，而是说自己与二三僚友相与编辑。现从朱彝尊《经义考》卷二十九中将曾程原序节录如次：……淳熙乙未夏五月，程代匱龙舒，因与二三僚友语及先生之学，皆欣然有得。谓程曰易道盖生生不穷，未尝拘泥，胡可不传！遂相与哀伊川家所尝发挥大易之旨者，明道伊川、横渠、广平、龟山、兼山、白云，合七先生，集为一书，目之曰《大易粹言》。从这篇序言中看不出任何方闻一编辑此书的迹象与根据，反而证明是曾程主持，并与二三僚友相与哀辑，以成此书。且本书卷末镌有程九万、李祐之两跋，亦足证此书为曾程所辑，非方闻一也。程九万跋称：“右《大易粹言》一编，太守曾公所哀集也。始，公欲刊是书，集僚属语之，于是门下士程九万欣然前曰：‘是书之成，所惠于后学多矣。……寥寥千百载间，有伊川二程先生者，采三圣之用心，与一时诸公讲究至到，可为学者据，依然犹病其文字之间见帙籍之散漫。今公会而通之，贯而一之，诚有功于圣门，端不止于哀集而已。学者于是而得其所宗矣。书成，遂述前日语以书于末云。’淳熙四年正月日门生迪功郎舒州望江县主簿主管学事程九万跋。”曾程门人李祐之的跋文称：“昔伊川先生发挥大易之旨，独止于六十四卦，而系辞无传，学者惜之。惟当时诸公之所讲究，间见层出，亦足补其缺。然编帙散漫犹病焉。祐之蚤获游温陵曾公之门，公平居议论，必及于《易》。而伊川之学尤所笃好，故尝以亲受白云之说，合伊川兄弟而下共七家，欲饒之而未能也。洎来群舒，出以相示，且俾订证其非是，期与同志共之。凡涉书七十有五种，为字四十五万有奇。义多互见，辞或重出，而后伊川之《易》无遗憾之叹。噫，公之用心也盖深，而人之获利也亦博矣。门人西秦李祐之谨跋。”上述二篇跋文不但

无可辨驳地证明《大易粹言》为曾穉所编辑，还为我们考订《大易粹言》的成书，划出了特定的历史时间。前引曾穉自序称“淳熙乙未夏五月，穉代匱龙舒，因与二三僚友语及先生之学，皆欣然有得。……遂相与哀伊川家所尝发挥大易之旨者，明道伊川、横渠、广平、龟山、兼山、白云，合七先生，集为一书，目之曰《大易粹言》。”适见《大易粹言》之编辑，正式开始当在淳熙乙未（二年1175）五月之后。而舒州公使库雕造所贴司胡至和所具牒文称：“本所依奉台旨，校正到《大易粹言》雕造了毕，右具如前。淳熙三年正月日。”适见《大易粹言》之成书，又必在淳熙三年（1176）正月以前。因此，《大易粹言》的编辑与雕印，实际都是在淳熙二年五月以后，至淳熙三年正月以前这半年的时间里。这种速度令人吃惊、生疑和不解。而李祐之跋文所说“祐之蚤获游温陵曾公之门，公平居议论，必及于《易》，而伊川之学尤所笃好，故尝以亲受白云之说，合伊川兄弟而下共七家，欲铎之而未能也。洎来群舒，出以相示，且俾订证其非是，期与同志共之。”则透露出曾穉编辑《大易粹言》，可能在来守龙舒之前即已编成，且已欲付梓而未能如愿。因此在来守龙舒半年之内，经与二三僚友商议，走一走共同哀辑的形式，便很快付梓了。所以程九万的跋文开头便说：“公欲刊是书，集僚属语之。……书成，遂述前日语以书于末云。”但程九万的跋文，写于淳熙四年正月，故跋中所称“书成”，一定是指刻印已成，“遂述前日语以书于末云”。

此书之刻于舒州公使库，毋庸置疑，以其书后镌有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的牒文可证，牒文称：“舒州公使库雕造所，本所依奉台旨，校正到《大易粹言》雕造了毕。右具如前。淳熙三年正月日。池州青阳县学谕李祐之校勘；迪功郎舒州怀宁县尉许邦弼校勘；迪功郎新无为军无为县主簿方颐校勘；迪功郎舒州太湖县主簿张橐校勘；迪功郎舒州望江主簿程九万校勘；从政郎舒州

录事参军莫扑校勘；儒林郎安庆军节度掌书记赵善登校勘；从事郎舒州州学教授方闻一校勘；奉议郎权通判舒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陆同；朝请大夫知舒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屯田事曾穉。今具《大易粹言》一部，计贰拾册；合用纸数印造工墨钱下项：纸副耗共壹仟叁百张；装背饶青纸叁拾张；背青白纸叁拾张；椴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；赁板钱壹贯贰百文足；本库印造见成出卖每部价捌贯文足；右具如前。淳熙三年正月日雕造所贴司胡至和具。杭州路儒学教授李洧孙校勘无差。”

舒州公使库雕造所这纸具文，不但充分证明了此书的刻时、刻地，还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其他方面的信息。特别是关于宋代公使库刻书方面，提供了更加宝贵的研究价值。宋代的公使库，其性质类乎现在各级、各地行政机关的招待所，专为安寓来往官员。宋代公使库也从事刻书，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。但公使库为什么要从事刻书，它的执行机构是什么，机构负责人的头衔是什么，刻书有无营利目的等，就很少有人研究。上述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的牒文，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意向。

首先，公使库之有雕造所，即公使库刻书有专门的机构，这是过去鲜为人知的。（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引过此例，但论证的角度不同）此书之后所镌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的牒文，表明公使库刻书是有专门的实施机构的。虽然不能以此去概括所有的公使库，但各地的大公使库，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经常刻书的公使库，大概都会有此种机构。

其次，是公使库雕造所还有负责人，负责人的结衔是贴司，这在过去更是鲜为人知。上引舒州公使库雕造所贴司是胡至和。此人看来很负责任，办事也很有条理，所以项项公布得都很清楚。宋代公使库如果说类似现代的招待所，则公使库雕造所便类似现代招待所所属的出版社了。其贴司便相当这类出版社的社长

了。

再次，是过去所知公使库刻书，是在宋代刻书事业极其普遍、极其发达的氛围中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。多认为是风雅所致，是宋代刻书网络中的一目，未能更多地引起人们的注意，更未注意到它们刻书的经济效益。上述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的牒文，亦提供了这方面的研究意向。舒州公使库所刻《大易粹言》，每部开价捌贯文足；而工本如用纸副壹阡叁百张，装背饶青纸叁拾张，背青白纸叁拾张，椶墨糊药印背匠工食等钱共壹贯伍百文足，赁板钱壹贯贰百文足。工本总数不易估算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六记载宋沅州公使库重修整雕补到《续世说》一部，十二卷，计六册，用大纸一百六十五张，计钱三十文足，每张合零点一一五文。大青白纸共九张，计钱六十六文足，每张合七点三三文。以此做为参照，则舒州公使库所印《大易粹言》每部用纸壹仟叁百张，合钱约计一百伍拾文足。装背饶青纸叁拾张，背青白纸叁拾张，各合钱约二百二十文足，计四百四十文足。三项纸钱总计不过陆百文，再加上壹贯伍百文椶墨糊药印背匠等的工食钱；壹贯贰百文的赁板钱，总共是叁贯贰百玖拾文，粗计可以算做肆贯钱。这就是说，刻印一部《大易粹言》，工本不过四贯钱；可是每部卖价竟开到八贯文足，利润在一倍以上，不能不说是较好的经济效益。当然也应该是公使库开辟财源的良好途径。这大概是宋代公使库普遍刻书的本质所在。

此本在清代曾是天禄琳琅的继鉴之物，以其钤有“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”、“八征耄念之宝”、“太上皇帝之宝”、“乾隆御览之宝”、“天禄继鉴”等印记可证。《天禄琳琅书目续编》称“此本即种知舒州时书成刊印。至嘉定癸酉张嗣古以漫漶重修，则在后矣。”天禄琳琅馆臣对此书版本的考定十分精当。表明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此本，为宋时初刻初印；《四库全书》所录此书之底本，则是嘉定时张嗣古修补版片重印本，其价值身分

当然不同。《天禄琳琅书目续编》还称此本“每册前后有蒙古篆文官印。册末纸背印记云：‘国子监崇文阁书籍，借读者必须爱护，损坏阙污，典掌者不许收受。’按《元史·仁宗纪》，皇庆元年二月朔，徙大都学所置周宣王石鼓于国子监。二年六月建崇文阁于国子监。明《太学志》，崇文阁，元藏书所，今东讲堂有碑存。然则宋籍元藏，与石鼓同时度置，可云古矣。”今检北京图书馆所藏此书，与天禄所记一一相合。可证此书在元代便是政府公藏。八百多年前之遗籍，迄今完好如初，继续发挥古为今用的价值，实为书林盛事。

《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》二十卷 宋杨万里撰 张敬之校正 宋刻本 郑希圣、朱良育跋 每半叶十行，行二十一字，小字双行，行二十六字，细黑口，左右双边。

杨万里字廷秀，号诚斋，吉水（今属江西）人。生于北宋末帝赵桓靖康二年（1127），卒于南宋宁宗赵扩开禧二年（1206），享年八十岁。南宋绍兴进士，调零陵丞。时张浚谪居永州，勉以正心诚意之学，万里服其教终身。后改知奉新。孝宗时召为国子监博士。亦尝任秘书监。后以宝文阁待制致仕，又进宝谟阁学士。杨万里以文学知名，诗与尤袤、范成大、陆游齐名，称为南宋四家。初学江西诗派，后改变风格，以王安石及晚唐诗人作为借鉴，构思新巧，语言通俗明畅，自成一家。在当时便有“杨诚斋体”之称。亦能属文。诗文都能反映出他主张抗金，关心时政，关怀民间疾苦，并励名节。杨万里于《易》颇有研究，其为《易》作“传”，盖始自淳熙戊申八月（十五年1188），至嘉泰甲子四月（四年1204）脱稿，历时十七年始成。作于六十一岁至七十八岁之间，学识成熟，笔致老练。所以他儿子杨长孺说他“平生精力，尽于此《易》。”（见本书杨承议割付）此书初名《外传》，谓与“《程传》相表里。后乃去外字。”（见《铁琴铜

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一) 故成《易传》。由于杨万里曾为宝谟阁学士，故称杨宝学《易传》。又由于其书是由他的门人张敬之校正的，故又称《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》。

此书卷前有杨万里自序，卷尾又有作者后序。前三卷每卷卷端题：“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上经第×”；第二行下题：“庐陵杨万里廷秀”；第三行下题：“门人张敬之显父校正”。从第四卷起，下题只题：“庐陵杨万里廷秀”。杨万里后序称：“《六经》至夫子而大备。然《书》非夫子作也，定之而已耳；《诗》非夫子作也，删之而已耳；《礼》、《乐》非夫子作也，正之而已耳。惟《易》与《春秋》，所谓夫子之文章者欤。……嘉泰甲子四月八日后序。”可见杨万里是把《易》看成为孔子作品的。因而注夫子之书，传圣人之意，布德于时人，传教于来者。这大概便是他为《易》作传的良苦用心。故他死后便有僚属上疏建言，推荐他的《易传》进呈，以备乙览。故书前又有嘉定元年（1208）八月十八日下吉州给付笔札录进《易传》指挥省劄；又有嘉定二年（1209）四月二十二日《易传》进呈毕，宣付史馆下吉州照会指挥省劄。称：“八月十六日，三省同奉圣旨，依劄付吉州。本州移文故杨宝学家，抄录申发。续据承议郎前权通判道州军州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杨长孺状，申准本州公文，备准前项省劄，照对先父故宝谟阁学士杨万里生前所著《易传》，盖自淳熙戊申捌月下笔，至嘉泰甲子肆月脱稿，阅拾有柒年而后成书。平生精力，尽于此《易》。……爰因臣僚之上奏，遂辱君命之下取。惟先父著述之勤苦，乃一旦昭升而显行……。欣逢圣世，敢匿父书！敬拜给札之恩，谨出遗编之制。所有先父《易传》壹部贰拾卷，约拾伍万字……。”这就和杨万里后序所说吻合了。也就是说，杨万里《易传》经过十七年的笔削，于嘉泰甲子（四年1204）四月八日最后完稿。后二年，即开禧二年（1206），杨万里便与世长辞了。又后三年，由于臣僚的推荐，皇帝恩准，三省劄付，吉州移

文，便由他的儿子承议郎杨长孺主持誊录进呈了。因此，杨万里的《易传》，不同于一般经师宿儒的解经之作，而是得到了官方认可的。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，亦著录《诚斋易传》二十卷，称“宝谟阁学士庐陵杨万里廷秀撰”。并说“其序以为《易》者，圣人变通之书，惟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；为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，中正立而万变通。又言古未有字，八卦之画即字也。”足见杨万里传《易》，正如其为人的品格，求其中正而已矣。

此书之刻，当然要在嘉定二年（1209）四月进呈之后，但为宋时所刊雕，是无庸置疑的。然具体刻于何时何地，则难以稽考。此本为竹纸印造，字体颇有柳公权笔意，看去极类闽中刻本。此本，北京图书馆珍藏两部，皆为完帙。一部经元人郑希圣；明人朱良育、毛晋、清人徐乾学、汪士钟、杨以增等收藏，后归北京图书馆；一部经瞿氏铁琴铜剑楼收藏，后归北京图书馆。前者钤有“郑氏希圣”、“三家村芭蕉林下散人”、“东郡西崦朱未英书画印”、“东吴毛氏图书”、“子”、“晋”、“徐健菴”、“乾学”、“汪士钟曾读”、“杨印以增”、“宋存书室”、“东郡杨绍和印”、“杨氏海源阁鉴藏记”等印记可证。且有元人郑希圣、明人朱良育两道亲笔跋文。郑跋称：“右诚斋《易》，乃旧本也。鬻书客潘生所售余者，置诸芭蕉林中读书处。时至大二年龙在己酉端阳节日。郑希圣谨志。”跋后钤盖“郑氏希圣”、“三家村芭蕉林下散人”两印。郑希圣行实无考。从跋文及印记看，很可能是宋末遗民，入元不仕，避地林间的隐士，所以以“三家村”标榜，以“林下散人”自许。可见其恃才傲物，孤芳自赏，雅好自然的品格。郑希圣写这纸跋文时在至大二年（1309），距此书誊录进呈刚好是一百年。而距宋亡仅只三十八年。一书经元人收藏，且留下亲笔题跋，实属罕见。无疑这就更加提高了此书的珍贵程度。入明之后，此书又辗转归朱良育所收藏。朱良育字叔英，吴县人，明正德间贡生。他获藏此书后也

写了一道跋文。跋称：“杨万里诚斋《易传》二十卷，自淳熙戊申至嘉定甲子，凡十七年始脱稿。前后序文皆公手笔。其说本伊川，而多引史传事证，盖象数之学蔑闻焉。嘉定元年臣僚申请得旨，给劄其家钞录，宣付秘阁。此本纸札精好，真三百年物也。书后有元人郑希圣题字，在至大二年己酉，距今二百八年矣。予得之祝希哲，哲得之朱性甫，甫得之南园俞氏。知其为俞石涧先生家藏。呜呼！凡法书名画流传人间，君子付之烟云过□□□□□□言也。是果人之玩物乎，抑物之玩人乎？追慕古人，慨感系之。正德十一年丙子夏四月三日吴郡朱良育未英书于西崦草堂。”跋后钤“吴郡西崦朱未英书画印”印记。朱良育这篇跋文价值并不高，但他历数此书的递藏程序，却颇有参考价值。他所说的最早收藏者，是南园俞氏，即俞石涧先生。俞石涧名琰，字玉吾，吴县林屋山人，南宋宝祐间以词赋称。入元征授温州州学学录，不赴，隐居吴之南园。老屋数椽，古书金石充牣其中。居傍石涧，学者称为石涧先生。生平邃于《易》学，所著《周易集说》、《易图纂要》等书，皆覃精研思，积数十年而始成。因为他自己深研《易》学，故于《易》之各种著作、各种版本，便不能不竭力搜求。《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》大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入藏的。此书如果真的是他在宝祐间收集到的，则此书的刊版时间，便被限制在嘉定三年（1210）至宝祐六年（1258）这四十八年间了。明末，此书归入毛氏汲古阁。入清又迭经徐乾学、汪士钟等收藏，后归杨氏海源阁。然杨氏《楹书隅录》又称：“此本《百宋一廛赋》著录，每半叶十行，行大二十一字，小二十六字。前有自序及奏劄”。故此书盖亦尝入黄氏士礼居，由士礼居再入汪士钟艺芸书舍，再入海源阁，最后归入北京图书馆。

另一部原藏瞿氏铁琴铜剑楼，后归入北京图书馆。检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卷一，的确著录了此书，亦鉴定为宋刊本。并撰提要称：“《张先生校正杨宝学易传》二十卷，题庐陵杨万里

廷秀撰，门人张敬之显父校正。前后皆有自序。前序后次以诚斋《易传》投进本末，载割两通：一下吉州录进《易传》指挥省劄，后大书嘉定元年八月十八日；一《易传》进呈毕宣付史馆下吉州照会指挥省劄，后大书嘉定二年四月二十二日。其为宁宗时事，确有岁月可稽。自鄱阳董氏误嘉定为嘉熙，而东里杨氏题《易传》稿后，遂称理宗尝诏给札其家录进。迨后刻本又刊去两劄，年月沿讹，至今莫有正之者矣。书作于淳熙戊申，成于嘉泰甲子，历十有七年之久。初名《外传》，谓与《程传》相表里，后乃去外字。此本校自张显父，盖最初之本。每半叶十行，行大字二十一，小字二十六。恒、贞、桓、構、慎、敦等字皆缺笔。《系辞》‘力少而任重，兼三材而两之，三材之道也，序卦必反于家，决必有遇于杂卦，盅则饰也’，皆同古本。殆即徐健菴尚书所称宋刊之精者，特非郑希圣所藏耳。明嘉靖间有二刻：一刻开州；一刻鄞县。而开州刻较前，所谓疗鹤亭本也。然其误已不可胜乙，姑以序言之，‘幽观其变，湛思其通’二句，误为‘于是幽观其通，故《易》者通变之书也’。脱故字，变在彼变，变在此脱，下变字于何求！中正脱中字。经文悉改从俗本。即此而宋槧之精亦略可见矣。卷首有‘夷白轩’、‘真实斋图书记’、‘汪士铉印’、‘文升’、‘民部尚书郎’、‘平阳汪氏藏书印’诸朱记”。这篇提要，前半部分是对该书的自然描绘，忠实地反映了此本的自然状况，同时纠正讹传，恢复该书编撰及投进的本来面目。后半部分考稽此本在文字内容上通同古本，判定即徐乾学所说的“宋刊之精者”，足见其鉴定功力之深。然又说“特非郑希圣所藏耳”，稍显含混其辞。这句话究竟是说此本与郑希圣所藏之本不同呢，还是说此本不是郑希圣原藏的那一部呢，莫可一是。其实这也并非瞿氏功力欠佳，而是其时尚无条件将两部书会到一起勘比的缘故。今两部同归于北京图书馆，两者一对，便知两部非但是同一版本，而且是同一次所印刷。因为其

纸张、墨色、开本等完全相同。这篇提要的价值在于它指出此书明代尚有二刻：一为开州疗鹤亭本；一为鄞县刊本。疗鹤亭本，瞿氏铁琴铜剑楼见过，并进行了初步的勘比，称其讹误已不可胜数。且经文悉改从俗本，远非古本之旧。北京图书馆今藏有明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）尹耕疗鹤亭刻本《诚斋先生易传》，与宋版相勘，确如瞿目所讲“而宋槧之精亦略可见矣。”

这两部书还有个特殊的现象，即书中带有前人朱笔句读、圈点，圈发、围讳等痕迹。前引海源阁《楹书隅录》尝言，此本“镂锲精工，犹是当时初印。书中用朱笔句读，遇宋讳並加规识。谨案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宋版《周易程传》云，全部用朱标界，凡宋讳作大圈围之，可证阅者为宋时人，则此本当亦宋人点勘。”今观书中点勘朱迹，虽颜色已大为减退，然点画符号却清晰可见。其中有点，显系标示重要字句；有圈，有的标示句读，有的标示发音；有直杠，有的标在时间之右，有的标在数字之右，有的标在书名、地名、人名之右，颇类现在整理古籍的专名线。满纸标示，朱墨烂然。可能是读书人随读随标，以便再读时易于理解和突出重点。是否为宋朝人的手笔，不敢武断。海源阁杨绍和于同治元年（1862）十月所写的上述题识，已据《天禄琳琅书目》所记别书的类似情况，推断此亦为宋人点勘，亦未可知。奇怪的是，铁琴铜剑楼原藏、今亦收归北京图书馆的一部，其朱色、点画、符号等，与上述原海源阁那一部完全相同，且似出自一人手笔。联想到南宋周必大所刻《欧阳文忠公集》，所见几部都带有朱色圈发。难道宋时有些书籍版印之后再请人点读圈画才予售卖发行吗？若果真如此，则上述现象已是后世套版印刷名人评语、圈点及句读的先声了。这就不仅仅是版本学研究的范围，而且是书籍史要研究的重要内容了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图书馆业务处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权儒学）